

人性的坍塌和守望

——论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郑宏伟

(浙江大学 校长办公室, 浙江 杭州 310027)

【关键词】人性;悖论;守望

【摘要】沈从文以湘西边地风俗和社会历史人生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南方地域文明的背景下,揭示了历史演进与人伦道德二律背反的永恒悖论,也为历史长河和人类生命神性的不竭长流作出了悲悯而执著的注解。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xxx-xxxx(1999)02-0028-08

Human Nature's Decay and Expectation

——On Writer Shen Congwen's Local Flavour Stories

ZHENG Hongwei

(President Offi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Key words: Human Nature; Paradox; Expectation

Abstract: Against a setting of regional civilization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China, Shen Congwen's voluminous literary work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local customs of frontier small towns as well as the history, the way of life and other social practices of Western Hunan; his stories bring to light the eternal paradox that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human ethics should always run counter to each other, providing an annotation to the never-ending process of history and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中外乡土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初民文化时期的神话、传奇等远古文学。事实上,整个农业文明史上的古典文学无不带有“乡土文学”的胎记。随着农业社会迈进工业时代,城乡文明的冲突在文学领域得到反映,乡土文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母题。其中以“风俗化描写”和“地方色彩”见长的乡土小说,直面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审视一个国家和民族生活中这一对历史性的文明冲突,其价值取向带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在这一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中,乡土文学大大促进了 20 世纪文学的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缩影——乡土社区的生存状态,成为当时思想家、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乡土小说也就成为五四新文学反封建意识最先找到的“载体”。在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及其作品《狂人日记》等的影响下,20 年代中国出现了一股“乡土小说”创作热,并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派。与这一潮流中提出的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创作方向及在“乡愁”表现中体现着同情怜悯农村、小乡镇中劳动者的人道真情在精神返乡情绪中,将乡土文化浪漫化为对宁静温馨的乌托邦幻想不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执著于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并从这一审美宗旨出发,努力在文化和精神意义上作寻根的追求。他的乡土小说作品系列,从湘西特定地域传统美好人性的复演开始,到关注这一人生形式在近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多重变奏,无形中完成了其湘西乡土小说作品的三个序列。在人性的炙烤和坍塌中,这一

【收稿日期】1998-09-23

【作者简介】郑宏伟(1966-),男,浙江江山人,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高等教育研究。

序列完整的作品将地方色彩和个人化写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全部文化批判和人性憧憬。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乡土作家所走的路不同,沈从文揭示了历史演进与人伦道德二律背反的永恒悖论,为历史长河和人类生命神性的不竭长流作出了悲悯而执著的注解。

一、人性的审美表现

20年代末,沈从文的小说逐步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作品构成了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第一个序列。在这一序列作品展示的古老湘西充满人性活力的神秘人生画卷中,作者着力表现了最能揭示人性深度的湘西性爱和婚姻形态。从“神尚未解体”的悠远蒙昧年代,到20年代社会大变迁之前,沈从文乡土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环境是湘西平静的一隅,生命形态呈现着活泼的自然本性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主体生命精神的本质显得纯朴蒙昧,表现为“其生如浮,其死则休”。这里,人性优美而雄强,拙朴而伸张,我们听到的是古老湘西人性的牧歌。

(一)自由生命的原始景观

《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凤子》从时间和内容上自成一个系列。这些作品没有指明故事发生的年代,生命的存在没有确定的时间形式。作者只是根据湘西原始风俗,以丰富的想象,在一个个民间传说般的美丽故事里,展示了古老湘西这一净土中健康、单纯、真挚、淳朴的美好人性,道尽了古老湘西“原乡人”的生存本色。其中两篇小说所显示的“原乡人”的生命存在形式,具有震撼人们灵魂的血色美艳,那就是《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

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复存而双双殉情的故事,无论是媚金、豹子或者雉佑及其恋人,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征。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受到等级关系及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生活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自然人”或者“原乡人”的性格范型,无疑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人格范型,是尚未被物质、虚荣所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二)自在生命的原生态景观

如果说远古湘西神秘感人的爱情故事,因其赖以存在的时代早已久远而显得虚无缥缈,爱情主人公的美好人性也显示出“不食烟火”的另一面,那么,沈从文另一部分乡土小说《柏子》、《雨后》、《阿黑小史》、《采蕨》、《旅店》等所反映的民国前后湘西农村的人生形态,则再次展示了湘西“自然之子”的遗风和昂扬的生命力。这一组作品也基本从性爱状态作透视,以同一个视角同远古湘西的纯美人性形成了一个承继和对照的关系。

比较《柏子》、《旅店》表现生活在底层的柏子们那种感官放纵的性爱愉悦价值观念和义利取舍原则,《雨后》、《采蕨》、《阿黑小史》表现的则是湘西小儿女尚未被都市文明所污染而在大自然的牧歌中自由生长发展的“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采蕨》、《雨后》同为描写边地青年男女在山上的调情相悦和“撒野”的情景,阿姐虽然“读过书”,却知道“女人只是一朵花,真要枯。知道枯得比其他快,便应当更深的爱。”而《阿黑小史》无论从人物性格、活动情景上看,则是短篇《雨后》的情节向中篇的扩容和延伸。同《柏子》、《旅店》一样,作者所做的只是通过这一人性中最自然的关系的表

现,将被“文明”扭曲的人欲还原到真正的“人”的本来地位,恢复自然本性的人性理想。

总之,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第一序列,大多以性爱表现为主题,故事中的人物从远古的民间传说到近代社会大变迁之前的平静年代,同自然万物一样单纯、质朴,跃动着原生态生命的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习俗和环境,个体生命有了对自身命运的自由把握,自然和社会的环境充满着牧歌色彩。

沈从文曾将“在‘神’之解体的时代”赞颂“神”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之一。他说:“我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和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意义时,来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1]《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龙朱》等可以说就是在“神”的解体时代,对生命中最具“神”性的“自然人”所唱的最后一曲赞美诗,而《柏子》、《旅店》、《雨后》等,则是对这“自然人”余韵的拾捡和回眸。

二、人性的炙烤和坍塌

在人类进化史上,社会文明的发展,既使人类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并逐步征服自然,同时也伴随着人对自然的背离和生命本性的失落。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分析黑格尔哲学时指出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2],“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3],受着“文明”与“自然”二律背反规律的制约,人性一方面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又给自身带来了新的束缚。当时代政治和社会剧烈变迁的巨大冲击渐渐溃毁了古老湘西封闭的堤岸,原始宗法制度和自由民经济出现解体,朴素的民风随之消失,这里的乡土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安宁,“童年”湘西已一去不返。“自然人”赖以生存的空间不复存在,健全质朴的人性被扼杀;沈从文第二序列的作品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幅湘西“原乡人”在“失乐园”后的生活图景和命运。

但是,即使在此“神”已解体的环境里,“原乡人”的性格也并没有完全被时代的大力所泯灭或彻底扭曲,人性的力量依然顽强地生长着。与第一序列作品不同,这一序列作品表现的则是健康人性面临的多重炙烤和重压下的坍塌。

(一)牧歌湮灭

地方风土的变化,人性的承继和演变虽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有时却会因巨大而突然的事变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和扼杀。在对湘西古朴人性“失乐园”后的重新追寻中,沈从文凭着湘西历史上“改土归流”年代发生的血腥事件,找到了最初的源头——《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撷取湘西苗村北溪“归化”事件,对清王朝武力废除湘西土司统治的断片进行了历史的再现。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司空见惯的流血事件,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却是一篇无声的政治寓言。在这里,历史的进步并不意味着自由、欢乐的新的降临,新政权、新制度的建立、巩固,使湘西原始文明被封建文明所劫夺和污染,初民文化被封建专制文化所取代,湘西的牧歌时代从此失去生存的土壤,人与人的自由交往被套上了“文明”的规约和等级的藩篱。于是,在自然牧歌环境中成长的健康正常的人性、人欲再也不能得到自由的爆发和表现,而只有通过畸形、变态的方式找到通向神性的途径。

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商会会长小女儿爱慕者中只有豆腐店青年对少女的爱才是真正纯洁无瑕、具有“神性”的爱。作者着意给这种“神性”的爱制造了在《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相同的氛围:山中的石洞,洞中的石床,纯洁赤裸的少女身子,身上地下蓝色的野菊花。似曾相识的情景,似曾相识的人物,这一切景象不仅消隐了恋尸事件表面的淫邪与罪恶,相反却见出了

在爱情和两性关系已被世俗权势扭曲和物化的社会制度和环境里的人性闪光。媚金、豹子的年代已经离去久远了，但在权势和物欲充斥的年代里，自然人性不惜以死亡相抗拒的突围，正是“神性”被迫以自身毁灭为代价的畸形而神圣的显现。

马克思在论及两性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时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4]在“失神”后的湘西世界里，由于现代文明的浸染，两性关系这一人的“自然本质”和“人的需要”，在现实关系中被侵蚀和扭曲而不堪重围，而且在人的观念世界中也被丑化，变得丑陋、邪恶和阴暗。小说《夫妇》对此作了深入的刻画。

小说以城里人“璜”的视点来观察描绘乡下人的生活，发现年青夫妇所流露的健康正常的人性，在“文明社会”麻木不仁的牺牲品、堕落乡村的集体象征和虚假人性的卫道者——乡村中人和乡村特权者的包围中，反被作为无耻邪恶、反常荒谬而受到了肆意践踏和污辱。城市“文明社会”的病患者“璜”，非但不能在乡村美丽的风光中淘洗城市文明的污染，重新恢复自然健康的生命力，反而发现乡村世界也已追随都市文明的脚步而逐渐失去那无邪、健旺的生命力和人性美。“城”里人已注定难以逃避这集体沦落的围堵，只有在那年轻妇人留下的枯萎野花中，寻味逝去的洁净乡村的生命气息……

(二)荒谬神性

发自人的内在自然本性的美好健康人欲、人性，在封建文明以至“现代文明”的阉割下变得麻木退化，沦落到了昔日黄花的命运，这不仅仅只是对人的自然本能欲求和对这一自然欲求的合理性的压制和摧毁，而社会美好理想、价值观念的迷失则更使人生显得苍白、怪诞和荒谬。沈从文军旅小说《会明》、《灯》刻画的两个“堂·吉诃德”式的老军人形象，使我们从他们的社会梦想和生活理想的破灭中，再次看到了生命神性的撕裂和覆灭。

这对姐妹篇同时提供了“守旧”而不自知的旧军人形象，将两个“多余人”、“边缘人”推出到战乱年代和都市生活的前台。两个人物同时具有“堂·吉诃德”式的性格特征：纯朴、执著、忠诚、守旧。相对于他们停留的观念世界，会明、老司务长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是陌生的，而造成他们与现实生活世界格格不入以至严重错位的则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神圣梦想。“伟人”情结和“守疆”情结成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也使他长年保藏军旗的行动和每打一仗便越接近“到国境边沿屯边卫国”的荒唐梦想具有了光荣和神圣的色彩。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是一个“义仆”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梦。“荣归”情结既是老司务长对于“我”的家庭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理想，也是支持他几十年的强大信念和精神支柱。

由于人物主观精神和现实世界的严重倒错，沉缅于理想境界中的会明成了军阀队伍中的多余人，司务长则成了都市喧嚣生活的边缘人，在本质上显示出其人生意志的非理性和荒谬性。然而，正如屠格涅夫对于堂·吉诃德的理解那样，在会明和老司务长身上，无不“全身心浸透着对于理想的忠诚”，“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与“虔诚的皈依和牺牲”^[5]。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如果说会明的“树林”意象寄寓着一个老兵对于和平社会的和平幸福之梦，燃烧在老司务长心中的薄明旧“灯”，则象征着作者对于未经污染的湘西古老乡村生命神性的美丽的怀旧。

(三)生命浮沉

当沈从文从回望湘西原始生命神性，到展示这一神性在现代“文明”社会演变中的炙烤和扭曲，

他的目光不得不被引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并获得了对于时代生活更为广阔的审察。如果说《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夫妇》等着重描述古老湘西生命神性所赖以存在的大背景、大年代的消失,《会明》和《灯》透视了动乱年代里生命神性被抛荒在大小名利场上的荒谬现实,那么,《丈夫》、《贵生》、《柏子》等篇则从湘西社会一组卑贱人物的生存挣扎中,再一次展示了在社会险风恶浪中人性被放逐的悲凉图景。

在这组作品中,《丈夫》借湘西农村流行的介于“典妻”和卖淫之间的腐朽社会现象,揭露了在经济破产情景下广大农民身受经济压迫和精神欺榨以及人性被践踏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在这双重欺榨下湘西农村社会出现的人性腐蚀和变异。《贵生》则讲述一个乡村青年佃户被地方豪绅“从狗嘴里抢肉吃”的“夺爱”事件,作者借这一人性之“恶”之“丑”对人性之“善”与“美”的胜利的故事,再一次揭示了处于经济依附地位的乡村普通人生在精神、人身方面受到践踏欺凌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反映出乡村社会的人性世界陷入附炎趋势、宿命偷生的麻木苍凉。

生存的依附性和生活希望的虚幻性最终决定了柏子、“丈夫”和贵生的“梦”的无望和破灭。在沈从文前两大序列作品中,这三篇小说首次将对人性的考察与对人生的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入发现了湘西农村社会中破灭殆尽的人性状态及其社会经济(制度)根源。就人性的对象而言,大而言之,表现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道德伦理;次而言之,表现于具有相对稳定的类的特征的阶层人生;小而言之,则首先表现于社会众生中的个体人生。而人性附丽于人生,必首先附丽于生活和生存。在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生存基础的崩溃造成了湘西农村下层人生物质上的贫困无依和精神上的麻木贫乏。而当社会的堕落腐败和求生的本能使两性关系和纯洁爱情被物化为可以“出让”和待价而沽的“商品”之后,社会人生在本质上已经幻化为人欲大分赃和人性大拍卖的“盛宴”。在这场“盛宴”里,不仅有嫖客、巡官和四爷、五爷这样明火执仗的操刀宰割者,也孵化出了水保、掌班大娘和杜老板、金凤这样的分羹者、乞怜者,而由于生存地位的失落,柏子、“丈夫”、贵生们所代表的健康纯美的人性,也已随着生存的无望同样丧失了社会人性主体的地位,遭到被放逐和封杀的命运。柏子身上保存着的人性多少具有自在状态中不问青红皂白和得过且过的“流氓”性与自我麻醉性,“丈夫”和贵生所代表的人性也只能通过非理性的消极退避或消极反抗,在孤苦无依的黑暗角落中舔舐自己滴血的伤口。在作品的象征意义上,三篇作品所揭示的人性“丑”、“恶”,已将人性的“美”、“善”赶杀得流落漂零,健康人性不仅迷失了方向,而且已经随着湘西生命主体从物质到精神的贫困,陷于没落的悲境。

(四)自由绞杀

经历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的剧烈变迁,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农村,也早已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变,经由“民国”新统治机构和政治秩序在湘西的确立,也毫无疏漏地将偏僻湘西裹挟进了这一现代中国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毁灭的搏斗漩涡中。从新旧军阀中产生的新贵们,以比当年康熙、雍正年间剿杀“七个野人”要“文明”得多的方式,完成了对湘西从政治、经济直至思想、文化的统治。所不同的是,“野人”时代的人们面对武力剿灭只有俯首称臣,而现代湘西却因外来社会变革和科学理性的传播,已经在小城镇的知识阶层和年轻一代中滋长了“开化”的“谬种”和“赤化”分子,他们是湘西社会在外来政治及文化冲击下产生的“新生代”。正是已在精神世界上走出湘西的这一代人中,诞生着对于社会变革的愿望,也诞生着对于把握命运的自觉追求,他们是新的时代环境中湘西社会的良知和新人性的代表。然而,在政治高压统治下的湘西社会,正如光明的“盗火者”——共产党人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一样,这批湘西新人性的代表也终究难逃现实政治的罗网。同是讲述民国十八年前后的故事,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菜园》、《新与旧》,构成了一对透视湘西现实政治生活的姐妹篇,揭露了湘西新人性的萌芽在白色恐怖下遭

受无情绞杀的命运。

《菜园》讲述的是湘西小城一对无辜母子的故事,《新与旧》则表现一个老刽子手在最后一次杀“共产党”的事件中导致的灵魂震颤和崩溃,暴露了湘西反动统治灭绝人性的“魔鬼”面目。从作者一贯以人性眼光考察现实社会的立场来看,通过两对青年夫妇的被残杀事件,作者所要揭示的正是他对现代湘西社会中新人性的发现以及这一新人性在政治“屠宰场”包围下的现实命运。

反动势力在湘西的血腥存在,任何政治信仰和民主自由理想都注定是不许“出生”和不容“生存”的。“最后一个刽子手”之死,是死于白色恐怖中的一场精神恐怖。相对于《丈夫》、《贵生》所揭露的,老兵在精神恐怖中的死亡,更具有人性被宰割的历史深刻性。

三、幻灭和守望

通过丰厚深沉的第一、第二序列作品,沈从文发现了古老湘西这片神秘故土亘古至今社会人生演变的历史轨迹。而这一切,从沈从文的文学初衷和创作实践来看,是从牧歌般的生命神性张扬、神往开始,又以这一神性在现代湘西多重覆灭的痛楚和悲悯而告终。然而,沈从文并未沉缅和满足于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作为一位热切关注现实人生命运的多产作家,沈从文又在30年代以他厚实的人生阅历,站在湘西历史与现实见证者的立场上,完成了湘西系列中的两大杰作——《边城》与《长河》。比较作家的第一、第二序列作品,《边城》更为本质地表现了湘西“失乐园”后人性自身面临的沉重负荷和永恒悖论,《长河》则在现代湘西风云激荡的背景上展示了生存的失落与抗争、主体人性的成长及回归的广阔社会图景。无论从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来看,这两部小说足以表明沈从文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可以相应归入为他的乡土小说的第三个序列。

(一)他乡明月

《边城》在30年代问世以后,即广受批评和关注,毁誉纷争。对其艺术表现方面取得的成功,似乎无可争议,而对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意义,却有着多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但在对《边城》流露偏爱的作者本人看来,似乎都近乎“买椟还珠”,无关痛痒,自认为“凡是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6]

《边城》的故事并不复杂,这部由21个章节组成的精致中篇讲述的是20世纪初叶湘西淳朴的地域风情中发生的爱情故事。小说融入了作者丰富、细腻的人生意绪,设置了意蕴丰富且流动的象征意象。从小说篇名“边城”,到“边城”所拥有的大自然美丽风光,从纯朴自然的人际关系及这种关系中“暗流”的出现,到作者对翠翠、二老爱情故事欲说还休的结尾,无不显现为一个完整无缺的象征喻体。深入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及各种人际关系的寓意,不难发现作者开拓出了一个人性的寓言视境。

在作品提供的视境里,翠翠和二老、大老的爱情三角关系,出现在古老湘西纯朴自然、博爱从善而不乏粗野厚直、野性生机的社会人际关系里。作为这一人际关系中第一代的老船夫和第二代船总顺顺,正是这种人际关系和人性美德的体现者和见证者,第三代大老、二老、翠翠则是在如此美丽山川和纯美人际关系、古朴民风习俗孕育下长成的纯正无邪的“自然之子”。但是,就在这第三代“自然之子”发生和憧憬着圣洁爱情的“这一刻”,纯美的人际关系已在“新碾坊”下面悄悄透出一股狰狞的暗流。由于财富和权势因素的潜入,爱情这一男女之间纯美人性的结晶,正裂变为世俗社会中的交易商品,爱情关系中的男女陷为交易关系中的配角。这种爱情关系中人性因素和商品因素的地位颠倒和背反,导致湘西近代社会的人性内涵趋于复杂,变得人心不古,旧情不再。原本在美

丽的自然环境和纯朴的社会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结果的纯真爱情和古朴人性,从此被迫从生活的真实退隐为心灵的真实,美好纯洁的人性从此成为湘西儿女永远索解不尽的“梦”,永远凝神费思的“乌托邦”。

爱情故事三个主角翠翠、二老、大老对于自由爱情的幻想和追求,体现了他们生命深处的自由意志和纯粹神性,表明他们是新一代湘西古朴人性的继承者。小说悲剧故事的两个“牺牲”者:大老和老船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命运和人生寓意。大老是作者为故事情节发展特设的“推进器”,检验矛盾纠葛中的人物关系的“镜子”,也是纯洁自由爱情的体现者和反证者。老船夫“爷爷”如同屋后的古塔,既是前后十几年中女儿、外孙女两代人两种人生命运的见证人,也是古老湘西纯朴人性的代表和“看护人”。面对自己料想不到的“车路”和“马路”的矛盾,对于翠翠的恋情,他依然如同尊重十几年前女儿自己的选择那样,也仍然顺从和尊重翠翠的选择,这既是老船夫对于自由爱情的尊重和“放任”,也是体现在老船夫身上的湘西古老人性的必然选择。老船夫的故去,直接动因源于对船总顺顺的猝然失望和对于翠翠命运的忧虑,其寓意恰如白塔在雨夜里的无声倾圮,象征着牧歌般纯美的湘西古老人性和社会民风基础在他这一代的最后终结。

作为一个随物欲世界的浮动而动摇的代表,船总顺顺是湘西古老人性由重生命神性和美德向重世俗物欲、权势的靠拢和转型的象征;而中寨“米场经纪人”则已惯于掂量“斤两”,为达到撮拢二老与团总女儿结亲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造谣中伤、落井下石,这一形象无疑正是作品塑造的堕入世俗功利深渊中的仗势“劫夺者”,是蛀蚀和导致湘西美好人性退隐的卑污人性的象征者。

作品倾注矛盾的最终主角,却是那个敢于以“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而忤逆父亲的二老。二老和他父亲一样面临“新碾坊”和“旧渡船”的选择,却没有父辈的世故和动摇。无论是对于爱情无私的自由追求,还是他的聪明多情和竹雀般善歌浪漫的灵性,在二老的身上,都集中体现着湘西古老人性和生命神性的继承和坚执。作品最后以二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结,已将二老幻映为人类生命自由意志和圣洁情感的终极喻体,意味深长地道出了对于物欲时代生命神性退隐的超然醒悟,并寄予了作者对在人性失落的年代里执著生命意志的悲悯和守望。

《边城》所述的“边城”已不只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和文化概念。它讲述的不只是一段历史的陈迹和单纯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同时也是一尊凝固定格的人性变迁的化石,在充沛的艺术感兴的影子下,深藏着社会人生历史的意蕴的《边城》的故事是地域性和历时性的,它反映的是 20 世纪初湘西社会大变动之前平静世风演变中的人性百态;也是获得广域性和共时性的生命意蕴的,这种广域性和共时性指明了一种普遍意义的人“在”之境。在人类“失乐园”后,“边城”之境即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在之时,“边城”即在。碧溪咀的“古塔”和“旧渡船”不在了,而源自人类生命的原乡的人性美,却似那“中夏十四”的明月,依旧四季轮回,常照常新。

(二)抗争与彷徨

从已完成的《长河》第一卷展示的思想与情感走势分析,这部长篇俨然是抗战前后湘西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实,同时也可看作《边城》故事在时间流序上的姐妹篇。正如作者在《长河·题记》中说的:“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长河》依然延续着沈从文惯有的文化视角,只是它的“常”和“变”,已经从《边城》中的一般民俗文化及其深蕴的意识观念层面拓展突进到政治文化层面,从而力图揭开现代湘西史上“五溪会猎”的隐秘帷幕,并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湘西主体人性的成长及回归和湘西未来历史长河的流向,寄予一个“湘西之子”的憧憬。

《长河》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抗战前后的湘西事变,小说的叙述指向,是以辰河口岸吕家坪为代表的湘西乡村灵魂合乎自然的生存形式及其面对人生大患所作出的反应与抉择。这种反应与抉择

体现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正是这些人物的个性表现及其对不平命运的抗争,使作品以其对乡下人言谈举止、心理状态及文化性格等近于神韵天成的刻画,完美地构成了整部小说对于这场历史变动中湘西民性崛起的艺术造型。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对主体生命存在的探索,《长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出与《边城》相对应的模式,从而也在湘西社会时间流程和变迁史上显现出“乡下人”的生命形式、生命神性随时而化的历史轨迹。老水手和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萌发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未来积极的抗争和憧憬,是《边城》以及《贵生》、《柏子》、《丈夫》、《会明》、《菜园》、《新与旧》等作品中的人物所没有的——虽然全作还笼罩着国民党政权下作者“完全明白”的“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作品中的民治思想也仍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湘西乡村生命形式仍无可掩饰地沿着湘西社会人性之“常”与“变”的历史长链而显示,以致在小说终卷处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既是湘西新民性普遍崛起的历史必然,也是湘西自主自立的主体人性和生命神性在现代政治角逐和社会文化背景上的成长和回归。正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背景上,《长河》篇名及其人物群像共同显示出沈从文湘西世界“过去”、“当前”、“未来”的时空流程,从中隐现出作者对于人类历史长河亘古长流的执著信念,也为作者本人的湘西乡土小说三大序列奉献了流显华彩的压轴之作。

文明伴随文化的冲突而演进,每一位求索者都无法漠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文化两难——历史与道德的永恒悖论。然而,对于作家沈从文来说,虽然真正的“精神家园”也许只存在于想象和梦幻的乌托邦,回归精神故园的“乡土之旅”注定将成为无尽悲悯的守望,而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代“游侠”和生命本来意义上的“乡下人”,沈从文及其作品也正像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斯”般,寂寞而悲壮地尽着那个看轻生死义利的“乡下人”的道义与责任。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米兰·昆德拉说:“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性的,什么是被发现的,什么是摹仿的。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7]

以此来衡量,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当无愧于称之为湘西的地域心灵史。

【参 考 文 献】

-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国内版第10卷[M].广东、香港: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1984.294.
- [2][3](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3.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A].王继志.沈从文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227-228.
- [5](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A].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C].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 [6]邵华强.沈从文研究资料上集[C].广东、香港: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1991.
- [7](捷)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伦敦、上海: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

[责任编辑 徐 枫]